

本报记者陈晓虎、张钟凯、顾煜

4月的高原牧场上春风微寒。变化无常的流云下，褪黄泛青的大地上，近百匹骏马正在奔腾，或棕、或白、或褐，时而传来几声嘶鸣，转眼就消失于高低起伏的草坡之中。

这是新疆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的辽阔景象。南倚天山，北靠乌孙山，昭苏县身处伊犁河谷中的一个高山间盆地，属于温带山区半干旱半湿润冷凉型气候，是新疆境内唯一没有荒漠的县。更因海拔较高、草原遍布，昭苏成了马的天堂。

40多年前，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在那个物资匮乏、百业待兴的年代，良马仍是紧急运输最现实的选择之一。中央政府第一时间想到了个头高、耐力好的新疆天马。

就这样，昭苏县紧急选派90多名职工，带着4000余匹马，历时50多天，穿戈壁，越冰山，风餐露宿，行程万里来到唐山参与灾后重建，留下一段“万里骏马送深情”的佳话。

这其中，大部分马都来自因国防需要、上世纪60年代建设的昭苏军马场。此后20年间，近万匹良马加入解放军骑兵队伍，成为中国边疆骑兵部队的重要坐骑，并在全军军马烙印编号中使用“八一”徽章，被当地人引以为傲。

打仗、戍边、救灾……被称为“中国天马之乡”的昭苏县自古以来就流传着有关马的各种故事。随着时代发展，市场对马的需求不断演进，“汗血宝马”的气质，英国纯血马的速度，荷兰温血障碍马、舞步马的技能……如今，新疆“天马”依旧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奔腾，因时而变，续写着新的传奇。

“天马”徕兮从西极

“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杈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鸡鸣刷燕晡秣越，神行电迈恍惚。天马呼，飞龙趋，目明长庚瞪双兔。尾如流星首渴乌，口喷红光汗沟朱。曾陪时龙跃天衢，霸金络月照皇都。逸气棱棱凌九区，白璧如山难敢沽。回头笑紫燕，但觉尔辈愚……”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天马歌》中对天马的一段描述，诗人更是以天马的神异自喻卓越才能。他笔下的“俊逸紫燕”，与昭苏等伊犁地区的“天马”有着密切关系。

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始新世，始祖马生活在稀疏树林草原中。有研究表明，野马可能是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欧亚草原被驯化成家马的。位于欧亚草原东部的伊犁河流域是家马的驯化地之一，也是新疆“天马”的原产地。

西汉初年，匈奴势力不断南扩，严重威胁着北部边疆的安定。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乌孙（今日伊犁河流域）盛产良马。

汉武帝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对马也是情有独钟。公元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返回长安，乌孙派数十名使者，向汉武帝敬献了数十匹良马，因其身形

汉武帝赐名，李白诗赞，平定准噶尔，救援唐山大地震……

「天马」再续传奇

矫健、轻快灵活，奔跑神速，汉武帝赐名“天马”。公元前71年，以新疆“天马”为基础组成的骑兵击败匈奴，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助力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夷夷服。”汉武帝以《西极天马歌》如此形容“天马”的神勇与英姿。

公元702年，唐朝在西域天山以北设立“北庭都护府”，昭苏是当时西北的边陲重地，所产的新疆“天马”为维护西域稳定和经济、文化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到唐高宗时，战马便从唐初的五千匹发展到了七十万六千匹，极大提高了当时军队的战斗力。

此后，历朝历代不少文人墨客都作诗神赞“天马”。

除了李白的《天马歌》，元末明初著名禅师释宗瀚也曾作《西极天马歌》一首：“天马来，自西极。流汗沟朱蹄踏石，胸目径度流沙碛。天子见之心始降，九州欲省民痍瘵。宛王何人敢私有，贰师城坚



昭苏县一家赛马场内奔跑的马。

新华社资料片（记者王婧摄）

亦难守。等闲骑向瑶池前，周家八骏争垂首。天闲饱秣玉山禾，苜蓿春来亦渐多。感君意气为君死，一日从君行万里。”

清朝乾隆年间，清政府在伊犁建立多处马场，培育良驹，以供军需，“天马”在平定准噶尔叛乱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如今位于昭苏县城西南约60公里的格登山，有一座俯瞰边境的格登碑，又称“平定准噶尔勒铭碑”。乾隆皇帝亲撰碑文，记述了清军在格登山平定准噶尔部叛众、经由乌什回部擒获叛军首领的经过：“格登之崔嵬，贼固其垒。我师堂堂，其固自摧。格登之巖薛，贼营其穴。我师洗洗，其营若缀。”

“天马”良繁逾百年

随着时代发展，市场对马的需求不断演进，“天马”也在改良“变身”。

“英国纯血马主要用于改良速度，培养竞技型马，阿哈尔捷金马可以帮助‘天马’提升气质；荷兰温血马能改‘天马’习性，培养障碍马、舞步马，阿登马可以助力‘天马’发展为重型马、肉用型和乳用型马……”

在昭苏马场的育种基地，除了伊犁马，记者看到了引进的20余种名贵马种，包括被称为“汗血宝马”的阿哈尔捷金马，每种马的体格和气质各异。被称为“马博士”的昭苏马场畜牧科副科长邓海峰在这个国内养殖规模最大的马场工作了21年。他告诉记者，从一开始靠“土马”打天下到现在越来越多引进“洋马”配种，新疆“天马”的改良育种已经超百年。

邓海峰告诉记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天马”与引进的苏联轻型马，包括奥尔洛夫、顿河、布琼尼等品种通过完善的育种工作，培育了骑乘和劳作兼用的品种——伊犁马。

作为“天马”后代，长期以来，体格高大、外貌俊秀、力速兼备的伊犁马主要用

于放牧或运输，是一种畜力或役用马。“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牧民的生活方式变了，人们对马的需求也相对降低了。”邓海峰说。

此后约20年时间里，马产业的发展一度受阻，马品种的研究和培育工作也按下了暂停键。

20世纪90年代，赛马在国内开始兴起，很多马场都意识到需要转型。1992年，昭苏马场从俄罗斯引进了3匹公马和3匹母马，“天马”的培育进入多元化阶段，育种重点开始向休闲骑乘型、赛事运动型、乳肉兼用型等方向转变。

“天马”的改良育种并非易事，新一代马的稳定育种需要大约经过6代、大概30年的时间。昭苏县马产业发展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李海说，对零散技术的搜集，传统技术的改造和新技术的研发，是形成良种马繁育标准体系的三大来源。

走近“大黑风”“小黑风”

在昭苏，有两匹新疆“天马”远近闻名，一匹叫“大黑风”，另一匹叫“小黑风”。

这两匹马的主人叫尼曼，是昭苏马场阿都勒伊犁马养殖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45岁的蒙古族牧民尼曼从小在昭苏的草原长大，7岁开始骑马，15岁开始养马，而“大黑风”就是他养的第一匹马，已经陪伴了他20多年。“大黑风”全身毛皮油黑发亮，跑起来像一阵风，也是第一匹为他带来赛马奖牌的新疆“天马”。

“大黑风”是第一代伊犁“天马”，今年已经25岁，基本从赛场“退役”。“它就像是我的亲人，一直不离不弃。”尼曼说。

真正让尼曼体会到“天马”产业甜头的是“小黑风”。“小黑风”的母亲是伊犁马，父亲是一匹从日本购进的英国纯血马，它是按照良种马繁育的标准在县上配种站繁育的杂交改良后的伊犁马。相

比前辈，“小黑风”速度更快、耐力更好，过去几年在“中华民族大赛马、2018传统耐力赛”等国内各大赛马比赛中频频夺冠，累计为尼曼赢得了超90万元奖金和4辆轿车。

“小黑风”3岁开始比赛，在屡创佳绩后身价倍增。有人想要出150万买“小黑风”，被尼曼拒绝了，如今它的后代已经可以卖到5万元一匹，“它现在是我的宝贝。我安排了两个驯马师来专门照顾它。”

除了养马、育马、赛马、驯马和卖马，从去年开始，尼曼组织合作社农户采集孕马尿，以一吨约7500元的价格销售给江苏某家制药企业，2019年销售额就超过了75万元。

尼曼的合作社目前有40多个成员，木县是其中之一。作为贫困户，他之前主要靠放牧和种地谋生，后来加入了合作社，目前月收入3000多元。木县自己也养了两匹马，“之前卖掉一匹马驹子只能赚1000多元，现在马改良之后，一匹能挣5000多元。”

尼曼的致富和木县的脱贫是新疆“天马”产业不断壮大，带动当地居民增收的一个缩影。

2019年，昭苏全县马匹存栏10.78万匹，马产业直接产值4.02亿元，占该县畜牧业产值的31.3%；农牧民人均马产业收入2460元，马产业对农村新增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贡献率为12.1%。通过育马养马，新型经济体发展、文化旅游、赛马赛事、技能输出等措施，创造就业岗位3000余个。

“天马”又飞腾

在昭苏，有一条“天马大道”横贯东西，路旁随处可见有关“天马”的雕刻、指示牌等。在天马旅游文化园赛马场内，可以看到穿着普鲁士蓝和猩红色马术外套

的青年驾驭着“天马”，迈着轻盈优雅的步伐进行马术表演。在天马文化博物馆，可以买到“天马”造型的靠枕、冰箱贴、皮革摆件等文创产品……在壮大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作为一个本土的文化符号，通过一系列产品和活动，新疆“天马”正在形成更大的品牌张力。

赛马、马术表演等活动在昭苏已经常态化，当地也在主动对接北京、成都、江苏、上海等地的马术俱乐部。就在今年，天马旅游文化园成立了专门的马术队，蒙古族的米特克勒是这里的一名资深驯马师。曾在北京学习马术的他，2008年作为引进人才来到昭苏，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驯马事业。

“马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而马术是一项力量与优雅兼具的运动，在人与马的完美配合中可以很好地传播马文化。”米特克勒说。

每年7月，“万马奔腾”的壮观场面都会在昭苏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演。自1993年起，这里每年都会举办“天马国际旅游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地的海外马术界专业人士纷至伊犁河谷，欣赏中国“天马”等世界名马的风采。

此外，“中国天山论马”高峰论坛已经连续举办十年，成为学界、产业界等探讨马产业和马文化发展的重要平台。

从全球范围来看，西方的马产业和马文化发展较为成熟，其中英国马业、马文化拥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在全球马业市场上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相比之下，中国“天马”产业和文化的发展仍然面临一定的挑战。

“我们要让‘天马’成为与昭苏旅游深度融合的文化符号，引领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昭苏县委书记张刚说。

长城外边也是故乡

本报记者丁铭、王靖

去年夏季以来，随着良渚文化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话题再一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在此情形下，同样在申报世界遗产、同为中华史前文明的红山文化，也引起了全球的高度关注，诞生红山文化的辽西地区也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追寻地。

长城以北，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1929年春，河南省安阳洹水河岸边的田野上，一群身着粗布衣裤的当地农民，在一位头戴遮阳帽、脖缠围巾的中国学者指挥下，正在对殷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主持这次发掘的中国学者叫李济，因1926年参加了山西省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而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由李济主持的这次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转折点，它确立了商文明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整个东亚地区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文明。

通过对安阳殷墟等考古发掘资料的研究，李济认识到中华文明起源绝不限于商代，起源应该在中国北方、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并呼吁：“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文明起源研究是个世界性课题。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国外学术界多认为始于商代晚期，以殷墟遗址为标志。经过包括李济先生在内的中国考古工作者不懈努力，中国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中华文明形成早于商代，在距今5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与民族考古研究室主任丛德新研究员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应从探索先商文化入手。那么，先商文化的源头在哪里？丛德新认为，从安阳往北，到辽西地区去寻

图一：“中华祖

神”陶人（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出土）。

图二：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沟遗址。

图三：红山文化玉猪龙（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河西遗址出土）。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找先商文化的范围，感受遗存的厚度、堆积的厚度，那里会给我们提供很重要的证据。

地处长城以北的辽西地区过于古老了，在这里举目远眺，可以看到一片片城墙。在这片土地上，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为中华民族保留下先民们近万年来生生不息的活动档案。

位于老哈河下游的兴隆洼遗址是辽西地区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因“兴隆洼文化”命名地而蜚声中外。走进这个先民村，就会被那秩序井然、布局严整的村落结构所震撼！

环村的界壕足以抵御敌人的偷袭和野兽的侵扰，秩序严整的房址如同当代人的村镇规划。村落中央的大型房址，可以容纳百人聚会议事。没有一定集约程度的耕作、采集和渔猎业，是难以维系这样大规模村落生存与繁衍的。

厚胎夹沙灰褐陶、磨光处理的石器、镶嵌精美的骨器和人面像，证明这

追寻红山文化足迹，探源中华文明



里的先民们已经跨进新石器时代的大门。还有那令人叹为观止的玉耳环，不知曾挂在哪位远古美人的鬓边。这个村落是氏族社会向部落转化的重要转折点，社会的第一次分工已经基本完成。

从兴隆洼文化到赵宝沟文化，辽西先民们在陶器上的作画已经到了令抽象画大师们瞠目结舌的地步。飞扬灵动的神鹿、遨游太极的神鸟、多维的构图，流畅纯熟的笔法，使人难以想象这是约7000年前的艺术杰作。

进入红山文化时代，辽西地区的先民们终于把新石器时代推向一个辉煌的极致。猪、鹿、蛇集于一身的原始龙形图腾，成为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代代传承的人文精神；庙、坛、冢汇集一体的建筑格局，奠定了皇权社会最早的原始人文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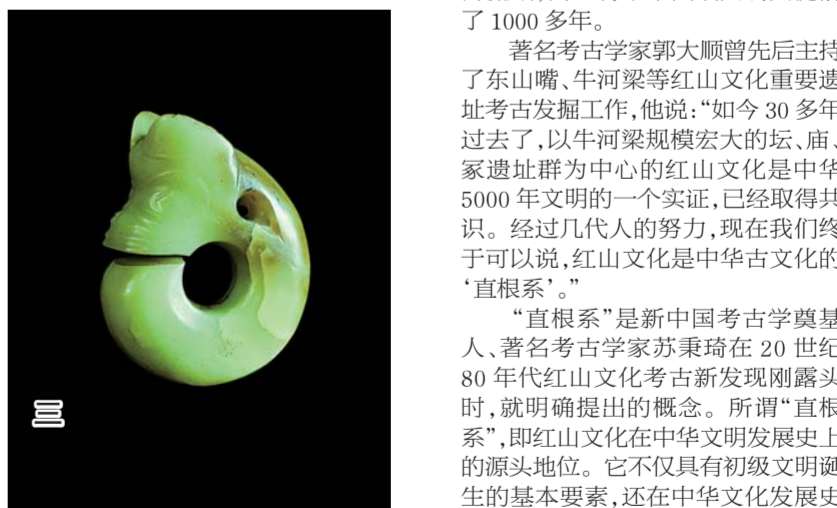
红山人崇拜生殖，崇拜女神，崇拜红与黑的色彩；长于农业耕作，留下无数精美的彩陶器；首创开山铸铜的先河，勾

云形玉器，马蹄形玉筒，三穿孔玉璧，胎儿状玉龙……不断的考古发现，向人们传达出令人身心悸动的文明信息——大约在5000年前的辽西地区，诞生了一个神秘而又高度繁盛的古国。

大甸子遗址，是辽西地区近40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面积7万平方米。城内有居住房址和宫殿遗址，墙外有围壕，围壕北侧外为墓葬区。

1974年至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这里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清理墓葬804座，出土1200余件精美的陶器、玉器、漆器、骨器、铜器、金器等，其中包括中国最早的金属贝币。遗址内还发现了中国建筑史上最早的竖向错缝城壕垒砌法……

所有这一切表明，夏家店文明已由红山文化的古国时代进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方国时代，为中华国家的“原生形态”起着一种规定性的奠基作用。



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

20世纪初，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者鸟居龙藏就注意到了位于辽西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城东北的那座褐红色山峦。

1922年至1924年，法国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发现了2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1930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辗转到达赤峰，收集了一批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

1955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在他所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里，首次将赤峰及周边地区发现的诸遗址称为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发现近百年来，特别是随着辽西地区东山嘴、牛河梁等一次次发现震惊世界，红山文化所覆盖的辽西地区成为中华民族更老的老家追寻地。

1986年7月25日，《光明日报》率先刊发消息：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找到新线索，辽西发现5000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家群址。考古学界推断，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把中华古代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民族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

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曾先后主持了东山嘴、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重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他说：“如今30多年过去了，以牛河梁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为中心的红山文化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一个实证，已经取得共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

“直根系”是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20世纪80年代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刚露头时，就明确提出的概念。所谓“直根系”，即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源头地位。它不仅具有初级文明诞生的基本要素，还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苏秉琦认为，中华文明应该有超百万年的根系，一万年的文明起步，二千年的中华同一实体。人类的文明是在不同的时空中多个源头汇聚起的长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介绍：“红山文明形成于红山文化晚期阶段，距今5300—5000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红山文化时期已出现中华文明传承至今的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

伴随着红山文化田野考古调查、发掘材料的不断积累与深入研究，现已确认在红山文化晚期阶段，以牛河梁大型墓葬和祭祀遗址以及兴隆沟、那斯台、哈民忙哈等不同规模的聚落遗存为代表，红山文化所在的辽西地区已进入初级文明社会。这意味着红山文化已正式形成，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中原地区古代文明互相影响、融合发展。

（下转11版）